

清季各省官书局考略

吴家驹

清同治年间，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以后，清政府为“重兴文化”，粉饰太平，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，相继在各省设立官办书局，大量刊印书籍，形成清季官刻图书之中兴现象，在客观上对保存和流通文化典籍起到积极的作用。所刻书通称“局本”，成为印刷史与版本学上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但由于岁月淹留，时至今日，各书局的资料多已不彰，乃至何局创于何年、何人之手亦不甚清楚。一些书籍和文章虽有所及，但往往说法不一，其中，颇多错讹。缘此，本文拟就五大官书局（金陵、浙江、江苏、淮南、湖北）以及江西、广雅诸局的设置与刊刻情况作一探索，还望共商于同好。

金陵书局

金陵书局成立于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为两江总督曾国藩所创设，后各省设局刊书，实发轫于此。而考索书局设立之经过，则又可追溯到安庆曾氏的军中之局。况周颐《蕙风簃二笔》云：“咸丰十一年八月，曾文正克复安庆，部署粗定，命莫子偃大令采访遗书。既复江宁，开官书局于冶成山，此江南官书局之椒落也。”又《续纂江宁府志》云：“同治三年四月，总督曾文正公与公弟今山西巡抚威毅伯刊《王船山遗书》，立局安庆。江宁收

复，移局东下，初设于铁作坊，后移至江宁府学之飞霞阁。”

（案：移局飞霞阁的时间，《国学书局本末》、《版本通义》皆作同治七年，诸文沿袭是说，而《首都志·历代大事年表》则记载为同治四年五月。飞霞阁，在今朝天宫内。）至同治四年十月，《船山遗书》刻竣，凡二百八十八卷，较之道光间旧刻书版，内容颇多增益。此时曾国藩“北征”未还，李鸿章署理两江，因与独山莫友芝子偲、南汇张文虎、甯山等议刻经史诸书，以其人其地而定名金陵书局。

书局“延请绅士一人督理局事，提调道府一人佐之，并延四方积学之士分任校勘”（见《续纂江宁府志》）。同治四年，监察御史乌程周学濬督理局事；七年，刑部主事丹徒韩弼元继之。六年，江宁知府六安涂宗瀛担任提调；八年，江苏候补道泾县洪汝奎继之（见《首都志》。案：洪汝奎，字琴西。《中国古籍印刷史》误作洪全奎）。分任校勘的有张文虎、戴望、刘毓崧、汪士铎、唐仁寿、李善兰、刘寿曾、刘恭冕等。同治年间是书局的鼎盛时期，飞霞阁内，文人学士云集。刊本之著者，如四书、诸经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文选》、《渔洋山人古诗选》、《读书杂志》，皆文虎所手校；《毛诗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、《后汉书》，则出自戴望之手；而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》一书，文虎考索尤深。五局合刊《二十四史》，金陵分其前五史，皆用毛氏汲古阁本。所刻书校勘精审，超过殿版，书成之后，又“平其值售之”，故盛销而不衰，以致京朝大官，纷纷索购。

光绪初年，金陵书局更名为江南书局（案：《中国古籍印刷史》误列江南、金陵为两局），由范志希提调局事，汪士铎、冯熙、成肇庆等分任校勘。至戊戌变法，刘坤一督两江，各省裁减局所，书局划归江宁府管辖，迁至夫子庙贡院街，而飞霞阁专储书版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后，江南书局归江楚编译官书局兼

管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四月，改江楚书局为江苏通志局。辛亥革命后，通志局中辍，江南书局为江苏省长公署及教育厅接管，改称江苏省立江南官书局，所储书版后归国学图书馆（今南京图书馆）。

浙江书局

《中国古籍印刷史》云：“浙江书局是浙江省布政使杨昌濬、按察使王凯泰二人为迎合曾氏，于同治三年呈准巡抚马新贻设立的。”而《浙江文献丛考》及《浙江官书局史料》又称该局成立于同治四年（1865）。其实，二说均误。杨昌濬、王凯泰直至同治五年（1866）方分任浙江布政使与按察使（见钱实甫《清代职官年表》），浙局设立时间应为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根据是此年十月十二日马新贻《建复书院设局刊书以兴实学折》所云：“浙省自遭兵燹，从前尊经阁、文澜阁所存书籍，均多毁失；士大夫家藏旧本，连年转徙，亦成乌有。……士子虽欲购求，无书可读，而坊肆寥寥断简残编，难资考究，无以嘉惠儒林。自应在省设局重刻，以兴文教。当经臣批飭迅速举办，即于四月二十六日开局。”又，钱塘丁申在《武林藏书录》中云：“同治六年，抚浙使者马端敏（即马新贻，谥端敏——笔者注），加意文学，聘薛慰农观察时雨，孙琴西太仆衣言，首刊经史，兼及子集，奏开书局于篁庵……”丁申为同光时人，与弟丙同为八千卷楼主，浙省开设书局，多藉其家藏本以补校勘，故其说亦为一有力佐证。

浙局成立之初设于杭州小营报恩寺。光绪中，盛康提调局事，扩大书局规模，迁至正中巷三忠祠，而以报恩寺为官书坊。分任校勘的前后有杭州谭献、绍兴李慈铭、嘉定张鸣珂、定海黄以周以及张大昌、张颜、王治寿等。同治六年，首刊《钦定七经》、《御批通鉴》、《御选古文渊鉴》，后参加五局合刊《二十四史》，分其新旧《唐书》、《宋史》。至光绪乙酉（1885），凡二十年，刊书达二百余种，其著者如：《二十二子》，以各名

家藏校本与明世德堂本为依据，是子书丛书中最为完善的刻本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以爱日精庐本为底本，以文渊阁残本校之，局中高手杨文莹、戴兆春等参加校勘，“有一字之疑，必考之《宋史》，又参考于宋代记载之书及诸家文集，以求其是；俞太史樾复综核之”（见浙局本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序》）。他如《九通》、《玉海》等，均精校密勘，在“局本”中首屈一指。至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书局归并浙江图书馆，改名为官书印售处，民国以后又改为浙江图书馆附设印行所，官书坊易名为发行所，移至大方伯街图书馆旁。此后所刻书籍有《章氏丛书》、《温州经籍志》、《蓬莱轩地理学丛书》、《文澜阁书目》等，以浙江图书馆名义刊行。

江苏书局

江苏书局设局何处，本不应成其为问题，但根据目前情况，却大有澄清之必要，因总是有人凭主观想象而加以推断，如《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·出版大事年表》云：“1869年（同治八年），江宁、苏州、武昌相继设立官书局。”这里所谓设于江宁的书局，无疑是指江苏书局。《古籍基础知识问答》则明确说明：江苏书局，局址江宁；苏州苏局，局址苏州。而笔者以为，江苏书局与苏州书局只是称呼不同，实为一局，一以省名冠之，一以地名冠之，局址江苏苏州，理由如次：

一、以设置言，清初设江南巡抚，驻苏州。康熙时改江南为江苏、安徽二省，江苏省署仍在苏州，而江宁为两江总督驻地，已设有金陵书局，江苏设局理应不在江宁。

二、江苏书局刊本《资治通鉴》丁日昌序云：“日昌奉命抚吴，幸处东南乱定之后，奏设书局，首刊《牧令书》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吴”地，即苏州一带，代指江苏。

据此，江苏书局局址已明，其创办人也不像《官书局书目汇编·引言》所说的那样“大约江苏的官书局是成于曾国藩、曾国

荃之手的”。至于江苏书局设立的时间，不是同治八年（1869）而应是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有江苏巡抚丁日昌此年二月《设立苏省书局疏》为证：“奏为苏省设局开刊书籍，拟刻牧令各书，以端吏治而正人心……。”《中国丛书综录》亦著录：《牧令全书》，江苏书局同治七年刊本。

江苏书局刻书有：《二十四史》中的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三史、《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》、《五礼通考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小学纂注》、正续《资治通鉴》、《资治通鉴目录》、《明纪》、《碑传集》、《苏州府志》、《陆宣公集》、《东雅堂韩昌黎集注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鉴》、《储选唐宋十大家全集录》等，其中，以翻宋本《资治通鉴目录》和翻刻鄱阳胡克家本《资治通鉴》为善。辛亥革命后，书局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（今苏州图书馆）。

淮南书局

淮南书局创于何人之手，笔者尚未见到第一手资料。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云：“迨乎中兴，曾文正首先于江宁设金陵书局，于扬州设淮南书局。”《版本通论》则云：“同治八年（1869）盐运使方济国倡立淮南书局于扬州琼花观街，初曰养贤馆，后名书局。”（案：此间两淮盐运使为方濬颐，字子箴，号梦园，是否又称“济国”，不详。）

淮南一局在五大书局中刻书较少，主要有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经籍纂诂》、《毛诗注疏》、《四书集注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两淮盐法志》、《东都事略》、《白虎通疏证》、《述学》、《南宋杂事传》、《古微堂内外集》、《初唐四杰文集》等，其中，以何绍基手校大字本《毛诗注疏》为佳。五局本《二十四史》中，分其《隋书》，由江都薛寿校勘，后附《考异》，极为精审。《三国志》将原小字双行改为大字单行，以木活字排印，爽朗悦目，据说为何绍基所创议。书局

于光绪末年裁并江南书局，所储书版，后归国学图书馆（今南京图书馆），见于《首都志》卷十五。

湖北书局

湖北书局又称崇文书局，局址武昌巡道岭。《中国古籍印刷史》云设立于同治末年，但根据书目记载，同治七年（1868）已刊有《仪礼注疏》（见邵懿辰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）。可见至迟在同治七年已经设局。创办人不详，《官书局书目汇编·引言》云创于左宗棠之手，但纵观各省官书局之创始者，均为当地军政大员（总督、巡抚等），而左氏此间督陕甘（前推则督闽浙），为何去湖北设局，尚不解。湖北一局刻书二百余种，四部皆备，丛书有：《百子全书》、《崇文书局汇刻书》（一名《三十三种丛书》，《古籍基础知识问答》误作“刻有《百子》等三十多种丛书”）、《正觉楼丛刻》等；单刻本有：复刻张氏影宋抚州本《礼记正义》、黄本《仪礼注疏》、抱经堂校本《经典释文》、《说文义证》、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、《史记》、新旧《五代史》、《明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明通鉴》、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、《湖北通志》及《文选》、《龙川文集》、《乐府诗集》等。所刻以实用为主，校勘不精，但其中亦有佳者，如仿黄丕烈刻本《仪礼注疏》、仿明震泽王氏刻本《史记》及《百子全书》部分零种。

山东书局

山东书局亦称皇华书局，同治间设于济南，是各省官书局的分销处，藏书甚多，这一点可从《官书局书目汇编》中得到证实。所刻书有：《周易本义》、《十三经读本》、《孔丛伯说经五篇》、《资治通鉴纲目四编合刻》《通德遗书所见录》、《山东通志》、《山东考古录》等。以山东巡抚丁宝楨等校勘的《十三经读本》为著。

江西书局

江西书局设于南昌。《中国古籍印刷史》云创设于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而实际时间应为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，根据是同治十一年四、五月间江西巡抚刘坤一《设局刊修经籍片》（此奏未具日期，前奏为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，后奏为同年五月二十八日）：“……先因纂修省志未能同时举行，现在省志稍有规模，应即遵旨设局开办。查藩司署内本藏有御纂、钦定各经等项书版，历年久远，残缺不全，难以刷印。臣现饬候补道缪德棻会同各司道仿照江苏、湖北等省办法另立书局……”云云。

江西书局刻书有：《御纂七经》、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纪事本末五种》、《粹园医学六种》、《武英殿聚珍版书》等。

广雅书局

广雅书局创于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，局址广州文明门外聚贤坊，即今文德路广东中山图书馆。由两广总督张之洞、广东巡抚吴大澂倡立。资料见于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张之洞《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》：“道光年间，前督臣阮元校刊《皇清经解》一千四百余卷，藏板学海堂……迨今六十余年，通人著述，日出不穷，或有藁草遗编、家藏槧木，当时未见，近始流传，亟应续辑刊行……现经臣等公同筹度，即将省城内旧机器局重加修葺，以为书局，名曰‘广雅’。臣之洞捐银一万两，臣大澂捐银三千两……檄飭两广盐运司综理局事，博访文学之士，详审校勘。”

广雅书局由王秉恩提调局事，总校为廖泽群，担任校勘的有屠敬山、王仁俊、叶昌炽等。五院（学海堂、菊坡精舍、广雅书院、粤华书院、粤秀书院）选本均由广雅书局校刻，其中，多经史名著。光绪年间陆续刊行的《广雅书局丛书》，行格疏朗，校勘亦精当，对历史研究颇具参考价值。以后所刻《全唐文》、《聚珍版丛书》，皆卷帙浩繁，虽不很精致，但切合实用。所刻以史部书籍为多。至民国，刻书总数逾三百种，藏版多至十五、

六万片，盖倡之者有力，而后来居上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广雅书局藏书楼改为广东省立图书馆，书局附设于该馆，改称广雅版片印行所。民国间，馆长徐绍桀续其余绪，整理发掘，刊行有年。

江楚编译官书局

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设于江宁钟山书院。初名江鄂，后名江楚（见《首都志》卷十五。案：《金陵书局小考》误作光绪二十九年设局）。经费主要由江宁提供，即所谓“宁任费而鄂具名”。聘缪荃孙为总纂，陈作霖、姚佩珩等为分纂，“编译新书，以开风气”。印行《说文通训定声》、《国朝事略》、《续碑传集》、《江宁金石记》以及《万国史略》、《江苏师范讲义》等新式教科书多种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四月改为江苏通志局，所藏中西书籍归国学图书馆（今南京图书馆）。

这一时期设立、具有一定刻书规模的官书局还有：成都的四川书局（亦称存古书局）、长沙的湖南书局（亦称思贤书局）、太原的藩文书局（后称山西书局）以及福州的福建书局。其中，四川书局所刻《相台五经》、殿本“前四史”、《五代史》，湖南书局所刻王先谦、皮锡瑞、孙诒让、叶德辉等近人著述，福建书局所刻《聚珍版丛书》等，均有一定影响，限于篇幅与更新的资料，不复赘言。云南、贵州两省书局成立较晚，刻书甚少，影响不大。而分设于保定、北京、天津的直隶官书局主要寄售他省书局所刊之书以及商务印书馆、文明书局、李光明书庄编印的各种课本，间亦印有书籍，如《归钱尺牋》等，本文且不作讨论。

一孔之见，错误难免，盼请各方教正。

引用书目（文内未明确部分）：

光绪《续纂江宁府志·实政》 光绪七年刊本

柳诒征《国学书局本末》

- 钱基博《版本通义》 古籍 1957
- 叶楚伦、柳诒征主编《首都志》 正中 1935
- 魏隐儒《中国古籍印刷史》 印刷工业 1984
- 刘尚恒《金陵书局小考》 载《图书馆杂志》 1987 5期
- 洪焕椿《浙江文献丛考》 浙江人民 1983
- 夏定域《浙江官书局史料》 载《图书馆研究与工作》 1980 2期
- 马新貽《马端敏公奏议》卷五
- 张静庐《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》 中华 1957
- 仇波、程德璋《古籍基础知识问答》 书目文献 1984
- 朱士嘉《官书局书目汇编》 中华图书馆协会 1933
- 丁日昌《丁中丞政书·抚吴奏稿》卷一
- 吴则虞《版本通论》 载《四川图书馆学报》1959 3期
- 刘坤一《刘忠诚公遗集·奏疏》卷七
- 张之洞《张文襄公奏议》卷二十三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

